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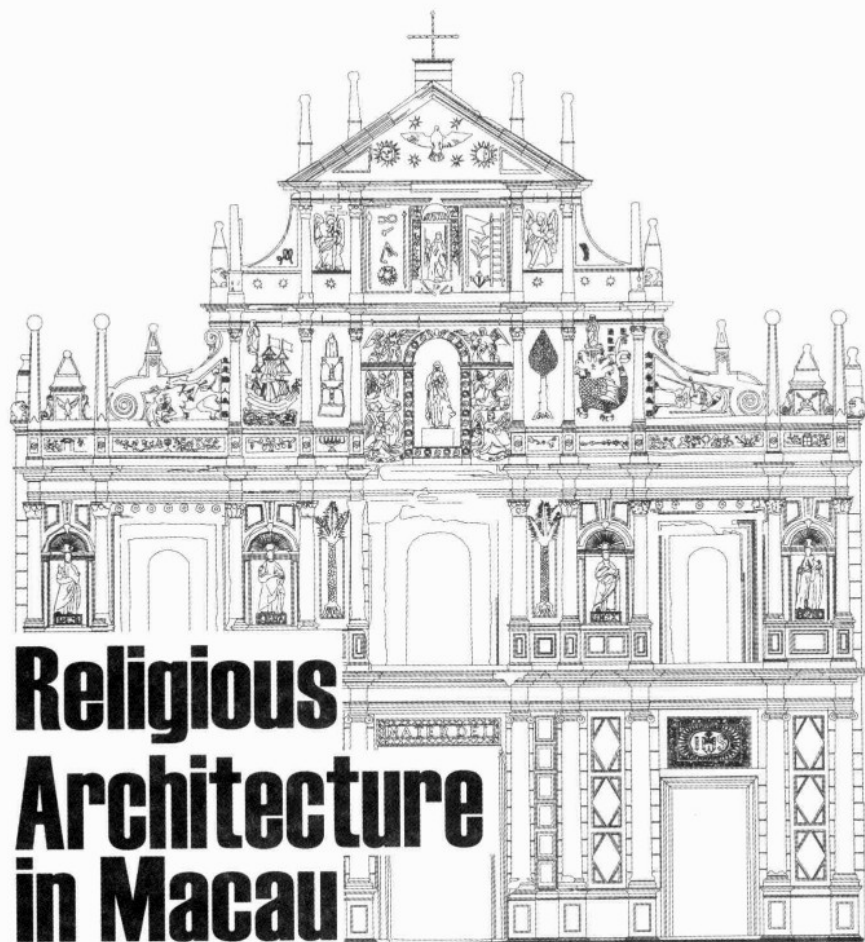
Religious Architecture in Macau

澳门宗教建筑

许政 ○ 著



中国电力出版社
www.cepp.com.cn



Religious Architecture in Macau

澳门宗教建筑

许政 ○ 著



中国电力出版社
www.cepp.com.cn

本书以东方背景下的“西式教堂”和西方背景下的“中式庙宇”为写作对象，列举了大量澳门著名的宗教建筑实例，梳理在特定的物质条件和精神理想引导下，中国人和西方人有关生存方式的不同选择及其建筑表达，探索原本在时间、空间和性质上差异极大的两种文明之间的和谐共存。

本书可供国内外城市规划工作者、建筑师、历史学者参考，也可供一般旅游爱好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澳门宗教建筑 / 许政著. —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8

ISBN 978-7-5083-6972-3

I. 澳... II. 许... III. 宗教建筑—简介—澳门
IV. K9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9345 号

中国电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三里河路 6 号 100044 <http://www.cepp.com.cn>

责任编辑：刘嵩 责任印制：陈焊彬 责任校对：太兴华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 第 1 次印刷

710mm×980mm 1/16 · 13.25 印张 · 210 千字

定价：38.00 元

敬告读者

本书封面贴有防伪标签，加热后中心图案消失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版权专有 翻印必究

本社购书热线电话（010-88386685）



前言^①

大陆学者有关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系统研究，始自 1950 年代，经过两代人持续不懈的努力，已经获得相当丰硕的成果。由于具体操作上的障碍，研究领域较少涉及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和台湾地区，因此至今不能说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整体框架基本形成。东南大学刘先觉教授是最早从事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学者之一，1950 年代曾在梁思成先生的指导下做过专题，1985 年成为汪坦先生筹备的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会十名成员之一。2000 年 7 月刘先觉教授参与主持“第五届中国近代建筑史国际研讨会”（广州—澳门会议），于稍后接受澳门文化局的邀请，承担“澳门近代建筑研究”课题。作为刘先觉教授的学生，我开始进入这一领域工作，拙作《澳门宗教建筑》即依据东南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

早先有关澳门建筑的专项研究，多由香港和澳门学者进行。1950 年代香港大学组织学生对澳门大三巴牌坊和圣多明我教堂进行测绘工作，并在《东方文化》杂志上出版专辑。1970 年，香港大学黄兆君（Wong Shiu Kwan）的硕士论文——《Macao Architecture: An Integrate of Chinese and Portuguese Influences》整理出版，这是一部较早以澳门建筑为专题的学术专著，内容朴素翔实，多论述自然条件对建筑所产生的影响。以后有关澳门的建筑短文散见于各种报刊杂志，专题著作则鲜有问世。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情况才大有改观。1993 年，葡萄牙人玛利亚·雷吉娜·瓦伦特 Maria Regina Valente 编著的《Igrejas de Macau》（澳门的教堂）一书出版发行，成为澳门教堂建筑研究的主要参考资料。1998 年，澳门文化司编印的《文化杂志》第 35、36 和 37 期，以“澳门四百年城市建筑遗产”为题，专门发表相关研究成果。1999 年 10 月，香港大学建筑系王维仁先

① 本书承蒙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编号 1005007）。

生以“澳门1999”为题，主编台湾《Dialogue》建筑杂志。这两个专辑在为当代澳门建筑作品提供展示场所的同时，也为关心澳门建筑历史的读者提供一个关于“殖民与后殖民”的纵深读本。2000年以后，华侨大学建筑系方拥教授指导澳门籍研究生撰写的多篇硕士论文——《澳门前地空间》、《澳门教堂建筑初探》以及《澳门文物建筑的现状与展望》等相继完成。2002年5月，清华大学建筑系澳门籍研究生黄伟侠完成硕士论文《澳门旧城区城市形态初探》。

纯粹意义上的澳门宗教研究是澳门史学家长期关注的对象。无疑，宗教是从文化视野考察澳门并挖掘其内在价值的一条重要路径。澳门开埠后，不仅商贸活动蓬勃发展，还迅速成为天主教远东传播中心。文德泉神父（Manuel Teixeira）撰写的16册巨著《澳门及其教区》（Macau e a Sua Diocese, 1940—1979），被学界普遍认为是权威的澳门传教史。另外，澳门《文化杂志》第21期是“澳门圣保禄学院四百周年论文特辑（1594—1994）”，《文化杂志》第30期是“澳门圣保禄学院文集（艺术·科技·文化）”，这两期杂志是研究澳门耶稣会圣保禄学院的重要参考资料。耶稣会在澳门曾经有着绝对的地位和不可估量的影响力，澳门拥有大量体现耶稣会活动的宝贵文献，所以澳门宗教研究的主要成果集中在耶稣会。相比而言，其他早期来到澳门的天主教修会，如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和奥斯丁会的相关研究就显得相当薄弱。

有关澳门教堂建筑的研究，既受到建筑师的重视，也受到宗教史学家的关注。建筑师撰写的文章多从形式角度出发展开描述，历史学家的文章多从教堂所引发的历史事件开始论述。历史研究和建筑描述始终在两条平行线上行走，有些关联，又似乎不太紧密。其实，从整体上看，因为澳门文化糅合多种成分，所以澳门建筑很难贴上纯粹的风格标签，即便集中大量人力物力才能完成的教堂建筑也是如此。然而，也许正是这种“风格的缺乏”才是澳门建筑最独特之处，才是澳门文化最富魅力之所在。

澳门的寺庙建筑与中国大陆相比，无论是建筑型制还是梁架结构，都有太多的随意之处，因为澳门的每一座庙宇大概都是诸神杂处的状态，有时甚至很难界定何为佛寺何为道观。即便是远近闻名的普济禅院，被誉为中国南方保存最完好的禅宗寺院之一，也难以于其中看到大陆常见的“伽蓝七堂”型制的

踪影。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一领域被中国建筑史的主流学者忽视。然而，近年来由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程建军教授指导的一系列测绘工作，收集到宝贵的一手资料，奠定了从建筑角度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关于澳门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的文献资料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一些有分量的考证文章相继发表，例如，姜伯勤的《大汕大师与禅宗在澳门及南海的流播》载《文化杂志》第13、第14期合订本，徐晓望《福建人与澳门妈祖文化渊源》载《文化杂志》第33期，以及谭世宝的“澳门三大古禅院之历史源流新探”载《文化杂志》第42期等。这些文章使我们对澳门的华人信仰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作为第一块被西方占领居住的中国土地以及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商贸港口，澳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近500年来中国与西方交往角力的全过程，澳门历史也从侧面清晰折射出中西文明交锋撞击的轮廓。澳门宗教建筑研究即是从物质层面解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澳门人的精神追求和生存状态。

本书写作对象是澳门地区西式教堂和中式庙宇的建筑表现。作者最感兴趣的地方在于探讨在特定的物质条件和精神理想的引导下，中国人和西方人有关生存方式的不同选择及其建筑表达，而不是比较“西式教堂”和“中式庙宇”在艺术手法、空间关系以及创作理念上的高下。文章最初的预设是，作为文化载体的建筑，多元并存的状态更有助于激发人性的丰富内涵。澳门建筑的案例不断证明，虽然葡萄牙文化长期以来占据澳门的主导地位，但是留存至今的诸多现象均是中西文化并行发展的结果。早期城墙之内是葡萄牙人居住区，城墙之外是华人聚落。在葡萄牙人城里，石构教堂是精神寄托；在华人区内，木构寺庙是力量源泉。葡萄牙人不断向东迁移，占据良港密布的南湾；华人沿西部内港发展，躲避海上风暴。葡萄牙人把房屋建在山顶上，居高临下，防御之心常备不懈；华人把房屋建在山脚下，背山面水，安居乐业。二者各取所需，和谐共处。

作者回避时下流行的“现代”手法，回避抽象的概念推演、宏大的理论预设或是自明的逻辑前提，尝试在综合把握史料的基础上，以谦恭诚实的姿态直接进入历史，直接面对、阅读并解析研究对象，在强烈的主体参与过程中，激活历史中那些与当下失去关联的思想资源，使研究工作始终保持一种开放与贴近对象的状态，期望由此可以得到符合史实的阶段性结论。

有关澳门历史的任何研究都无法回避天主教，天主教教会的基石则是耶稣会。16、17 世纪，耶稣会在世界各地取得普遍成功，其原因除了耶稣会士个体的人格魅力和献身精神以外，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广泛有效地使原本异质的不同文化相互接近，求同存异。凭借对于异族文化的体认，耶稣会士不断修正传教策略，使东西方文化交流得以深入持久地进行。哈佛大学燕京学院的杜维明教授转引的天主教神父一段感言可谓精辟：

“中国有句古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近代天主教所要做到的是‘己所欲，施于人’，当今天主教应该做的是‘己所欲，勿施于人’。”

从传教策略上说，作者以为，若果如此，天主教就能够以“己所欲，勿施于人”的方式再次达到“己所欲，施于人”的目的。从文化交流的正面意义上说，神父语境背后所暗含的是对多元价值的尊重与认同。如果价值多元论是世界的真相，那么关于它的抉择就无可回避。在澳门，除了天主教、新教、佛教、妈祖等主流信仰以外，还有诸如琐罗亚斯德教、巴哈伊教，以及华人庞杂的自然崇拜。我们很容易发现这里存在着多种选择的机会。虽然从建筑结构和形式的角度审视，澳门这些规模不大的寺庙和教堂实在难以同大陆寺庙和欧洲教堂相提并论，但是这些“小庙”、“小堂”所承载的文化蕴涵却极其深厚。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澳门文化的相对多样性有着人类终极关怀的重大意义。

比起今天的中国内地城市，澳门保留着更为浓厚的传统色彩，例如土地庙建筑在澳门就随处可见。虽然从建筑的物质层面看，这些土地庙根本谈不上高大雄伟，但是它们分布广泛，几乎遍及所有华人居住区，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在澳门根深叶茂。除了信仰正统的儒释道三教神灵以外，华人还供奉诸多的地方神祇，中国古老的自然崇拜在澳门得到延续。这一切都明确无误地表明，在异族统治的年代，在西方文化浸染的异地他乡，澳门华人顽强地坚守中国传统文化。

在“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的热烈呼声中，文化“民族性”的提倡也许有点不合时宜。然而认真追究，“民族”一词，无论是英语、法语，还是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或是意大利语，都来自拉丁语 *nascor*：意指“我出生”，其同义词 *orior*，衍生出的法语 *origine*（起源），同时带有出生和生长的双重意义。所

以，民族是一个人“出生”和“生长”的地方，是一个人、一种文化跟一块土地与生俱来的联系。法国文化人类学宗师列维-斯特劳斯告诫我们：

“每一个文化都是与其他文化交流以自养。但它应当在交流中加以某种抵抗。如果没有这种抵抗，那么很快它就不再有任何属于它自己的东西可以交流。”

澳门文化的适度民族性就是本书所要强调的另一要点。

当西方文化在各国官方和民间皆呈强势之时，我们追寻文化的多元格局，要求文化的尊严与宽容，即使站在中国以外的立场看，也是合乎情理的。作为建筑史专业的学生，在当今“欧陆风”劲吹之际，我们在强调人类建筑文化的相对多样性之外，更应当提倡建筑文化的适度民族性。将“建筑多样化”提到与“生物多样性”的同等高度，并不为过。正如哲学家赵汀阳所言：

“只有把文化看作是一个生命体，我们才能理解其中的那些不可还原的（the-cannot-be-reduced）、使我们感动而不可言说的东西（the-cannot-be-said）。杀死一种文化就是杀死一种生命（culture-cide is homicide）。特别是，文化是一个生态系统，它像自然环境一样是人类生活所需要的一种生态环境——如果没有好的自然生态环境，那么人类活不下去；而如果没有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则生活没有意思。文化的丰富性正是文化的生态要求，是文化保持创造性并且给予人类丰富的感动方式的条件。”

绪 论

一、澳门的地理和历史概况

澳门位于珠江三角洲的最南端，地处东经 $113^{\circ} 34' 47''$ 至 $113^{\circ} 35' 20''$ 、北纬 $22^{\circ} 6' 40''$ 至 $22^{\circ} 13' 1''$ 之间，今天的“澳门”包括澳门半岛和氹仔、路环两个离岛。作为主体的澳门半岛三面环海，北部与中国大陆接壤，距离华南最大的城市广州 145 公里，西面与珠海市的湾仔隔海相望，东面距离香港 42 海里（78 公里）。从更广阔的范围来看，澳门还是东南亚与东北亚航

路的桥梁，西南距离新加坡 2600 公里，东南距离马尼拉 1200 公里，东北距离东京 2800 公里（见图 1）澳门相对位置图。澳门在 16、17 世纪成为世界最主要的贸易口岸之一，优越的地理条件必不可少。

澳门一词最早出现在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 年）庞尚鹏的奏疏中：“广州南有香山县，地当濒海，由雍麦至濠镜澳，计一日之程，有山对峙如门。曰南北台，即澳门也。……议者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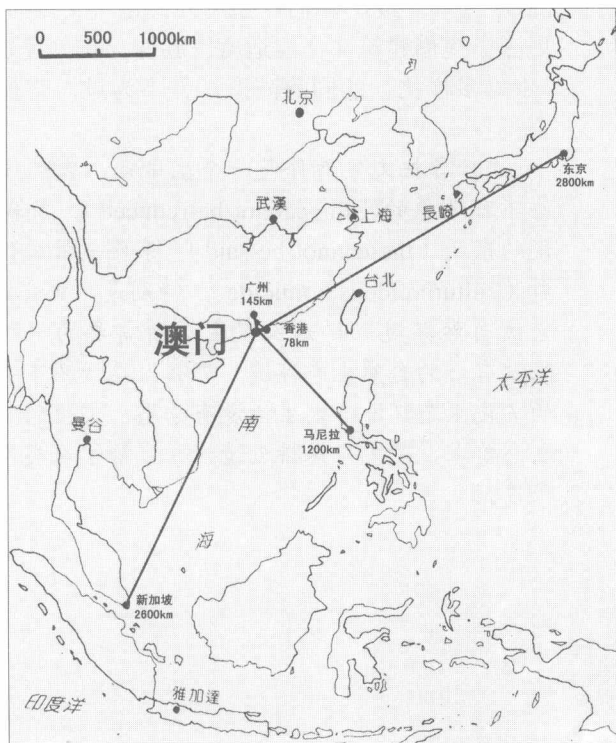


图 1 澳门相对位置图

在澳门狭处，用石填塞，杜番船潜行，以固香山门户。”广东人把可以让船舶停靠，躲避风浪，并且可以汲取淡水的弧形港湾称为“澳”。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澳门》条曰：“凡番船停泊，必须以海滨之湾环者为‘澳’。‘澳’者，舶口也。”清张甄陶《澳门图记》云：“凡海中依山可避风，有淡水可汲者曰‘澳’。”可见，澳门名称的由来源于形象化的比喻，指两山之间或两水之间，颇有建筑学上的空间意味。

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澳门半岛只有两个村庄，一是南端的妈阁村，村民以捕鱼为生，有一座妈祖阁；一是北端的望厦村，村民务农，有一座观音堂（见图2）。16世纪中期，葡萄牙人先在澳门港口附近的低洼地带搭设帐篷，随后建筑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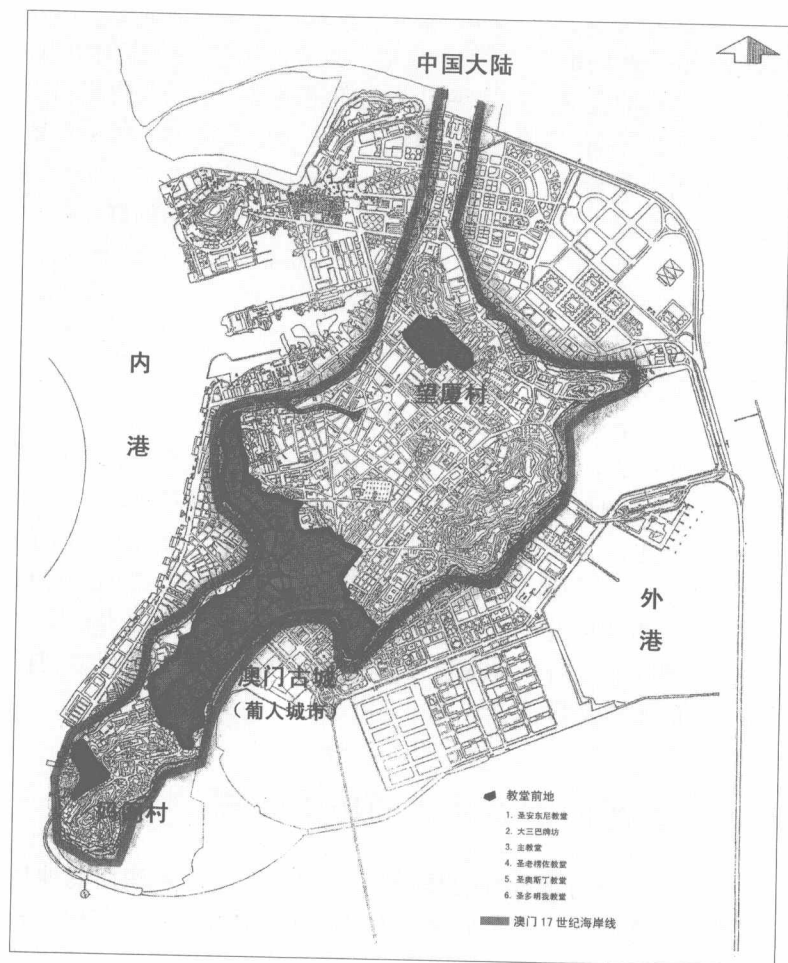


图2 澳门早期城市村庄位置图

屋。据《澳门记略》记载：“（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蕃舶托言舟触风浪，愿借濠镜地暴诸水渍贡物，海道副使汪柏许之。初仅茆舍，商人牟奸利者渐运瓴甓榱桷为屋，佛郎机遂混入。高屋飞甍，栉比相望，久之遂专为所据。蕃人之入居澳，自汪柏始。”1605年，葡萄牙人修筑城墙，立即被香山知县下令拆毁。稍后当朝代更替、政府自顾不暇之际，葡萄牙人抓住机会，屡拆屡建，终于筑起城墙。第一道防护是用土坯加固的木栅，把葡萄牙人居住区与华人村庄分开。1622年，坚固的石结构城墙终于改建成功，并在险要之处建有炮台。乾隆年间的澳门已经“城固而庳”，有城门四道——三巴门、小三巴门、沙梨头门和花王庙门。

葡萄牙人最早开发的区域呈长条状，房屋夹道而建，因此澳门俗称“澳门街”。这条“街道”正当两个华人村庄的中点，是澳门半岛的交通干线。通过北端的望厦村，可以获得来自大陆的生活必需品；利用南端的妈阁村，可以繁荣海上的商业贸易。相当于葡萄牙“正街”（main street）的龙嵩街将各个重要建筑物串联起来，如同鱼类的脊柱，其两侧与正街的联系就像“鱼骨”和“鱼刺”。龙嵩街是最热闹的商业大街，它向北延伸，和花王堂街相连，恰与半岛的自然中轴线重合。它贯穿澳门最重要的几座教堂，成为今天最佳的旅游线路。街道与建筑物之间的“前地”（largo）颇具葡萄牙城市空间特色，它形状适宜，布置随意，看似扩大的街道，又是市民休憩的小广场。

长久以来，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间和空间状态下，澳门半岛西南部的葡萄牙人城市与半岛东北部的中国人村庄各自独立发展，生活方式也泾渭分明，因而有人说：“澳门称‘澳门街’，望厦称‘望厦村’”。这种区分是极其有趣的，“街”意味着商业文明和由此产生的城市，“村”意味着农业文明和以此为基础的村庄，对峙状态表达了两个族群之间从思想观念到行为方式的本质差异。

二、澳门宗教文化的历史渊源

澳门被誉为“东方的梵蒂冈”，可见天主教在澳门的地位和影响。然而，即便天主教在澳门占据绝对优势时，其他宗教信仰也仍有一席之地，呈现多元宗教文化并存的局面。澳门地区种类繁多的宗教建筑，就是历史文化在物质层面的反映。

追溯澳门宗教文化传承的历史渊源，我们即刻面对的是葡萄牙的地理和文化传统。葡萄牙位于欧洲与非洲之间的伊比利亚半岛上，是联系两块大陆的天然桥梁，绵长的海岸线拥抱着名扬于世的贸易之海——地中海，独特的地理位置使葡萄牙自古就是各民族频繁往来与文化交流的中心。

公元前3世纪末，罗马人进兵征服，随即统治伊比利亚半岛长达700年之久。“罗马的和平”是严酷的，透过拉丁文和罗马法律，罗马精神在半岛上深深地扎下了根。当罗马影响衰微之时，基督教会承袭罗马产业，此时的半岛已经完成了“罗马化”过程。共同的语言、法律和信仰使伊比利亚民族与后来的欧洲邻邦紧密联系在一起。

公元711年，穆斯林军队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征服伊比利亚半岛。在以后的8个世纪里，伊比利亚民族一直在北方基督教世界与南方穆斯林世界的夹缝中生存。中世纪的伊斯兰教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虽然战场上剑拔弩张，但是基督徒深爱着敌人的文化。在今天的西班牙语中，约有4000个以上的词汇由阿拉伯文字转借而来，包括军事、商业、农业、手工业、矿业、政治、数学、天文学以及娱乐各个领域，强烈的伊斯兰教文化影响使伊比利亚民族明显有别于它的欧洲近邻。从12世纪开始，在雷蒙德（Raimund）大主教的支持下，基督徒和犹太教徒一起将阿拉伯文献翻译成拉丁文，这项工作为当时知识十分贫乏的欧洲大陆重新注入生命活力，同时，阿拉伯文献的整理为传播希腊化时期的文化遗产做出巨大贡献，使古代希腊文化在伊比利亚半岛重放异彩。

文艺复兴时期，由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结束了欧洲以基督教信仰统一社会的传统方式，使欧洲文化朝着世俗方向发展。然而，此时的伊比利亚民族与之背道而驰。从16世纪开始，他们以维护欧洲传统为己任，用来自新大陆的金银和新教徒作战，战争持续了150年之久，直到17世纪中叶才告结束。如果说，中世纪的伊比利亚民族是多元文化的享有者，也是多元文化的传播者，那么近代的伊比利亚民族就变成了欧洲传统主流文化的捍卫者。

葡萄牙本土文化以特茹河为界，有南北之别，南方以阿拉伯文化为主导，北方以基督教文化为根本。南方建筑是细腻的砖石结构，北方建筑是粗犷的花岗石结构；南方人继承了“哈里发精神”，北方人通过“汉萨同盟”团结在一起。蔚蓝色的

大海诱惑沿海的城市民众“远行”，是一种离心力；翠绿的山林鼓励内地的乡村农人驻守家园，是一种向心力……由于历史上的葡萄牙人总是处于战争状态，不是与南方的穆斯林作战，就是要防备近邻西班牙，强烈的不安全感使葡萄牙人寻求稳定、尊重传统、抗拒潮流。所以相对于主流和先进的欧洲大陆来说，葡萄牙文化呈现边缘保守的态势。在长期对立的背景下，求同存异、相互宽容似乎就是唯一的平衡点，这不是哲学上抽象的“辩证关系”，而是现实生活中的“生存之道”。当包容成为必然的选择，“现代”就融入“传统”之中，保守的缺陷自然得到弥补。在航海探险的年代，宽容使葡萄牙人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可是在强势的中华帝国面前，坚持不懈又使其具有牢固的独立性，这正是葡萄牙文化最具特色的地方。

至此，我们可以理解在葡萄牙人管理统治的几百年里，澳门为什么没有像欧洲的许多天主教国家那样，存有可怕的“异教徒”概念；澳门为什么没有像阿拉伯世界那样“一手持剑，一手拿着《古兰经》”。澳门宗教文化的终极意义就在于宽容，即每一个人都拥有自由选择精神家园的权利。在澳门，天主教和与之分裂的基督教新教和平相处，近代新兴的巴哈伊教有机会得以生根发芽，甚至于其发源地（古波斯，今伊朗）渐趋绝迹的琐罗亚斯德教也在澳门重获新生。澳门本无任何资源或文化上的优势可言，然而，正是宽容使澳门拥有无限生机。

相对而言，中华文化内部一样深植包容因子，无论国力昌盛抑或衰微之时，对于任何新鲜事物均有兼收并蓄的同化力量，“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积淀深厚的成熟文明理应具备这种磅礴的气势。也许正因为如此，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才得以绵延数千年而不衰。虽然明清之际的中国处于下降轨道，但是余威尚存^①，完全有能力将澳门纳入国内政治秩序中。16世纪的西班牙人、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人，曾经以不同手段多次尝试夺取澳门，但是都在明清政府的反对和干预下失败。可以说，葡萄牙人得以长期在澳门生存发展，有赖于中国政府的保护。因此，无论是客观限制，还是主观意愿，15、16世纪的葡萄牙人不可能采用掠夺非洲的方式——诉诸武力，强行进入中国，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和平渗透。一位葡萄牙史学家深有感触地说：

① 1750年，中国的制造总值占世界的近1/3，印度占将近1/4，而西方则占不到1/5的份额。

“面对一个如此深具个性的帝国，一个西方民族在中国只有两种方式可以生存：或选择英国使用武力的方式，或选择（葡萄牙人）管理澳门的方式。澳门由于缺乏强国所拥有的经济军事力量，必须求助于外交行动。面对中华帝国的高傲和传统，外交行动一方面要接受中国在礼节上和制度上（如中国海关的设立）的支配权；另一方面，必须重视那些令澳门成为一个对中葡政治经济同时有利的空间共同体。”

由此可见，虽然澳门长期受葡萄牙人的管理和统治，实际上也曾沦为葡萄牙人的殖民地，但是澳门与遍布世界的其他殖民地不同，葡萄牙人始终没能成为这块土地上的真正主人。1849年以前，明清两朝政府一直拥有澳门的行政权和司法权，1849年以后大权旁落。虽然如此，但由于香港的崛起，使澳门从一个欧美人士在中国的“唯一港口”，沦为中国东南沿海的“地方性口岸”。为了挽救危机，葡萄牙人开始重视澳门在中国沿海的贸易地位，此时，澳门的发展已经不是依靠欧洲贸易，而是当地华人的经济活动。在这样的背景下，葡萄牙人允许大量中国人迁居澳门，迄至民国时期，澳门人口直线上升，成为一座拥有十几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因为华人数量占据绝对优势，葡萄牙人于其中仅是沧海一粟，所以，中国文化在相当程度上得到尊重，中国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延续。

目 录

前 言	1
绪 论	6
一、澳门的地理和历史概况	6
二、澳门宗教文化的历史渊源	8
第 1 章 澳门的教堂	1
1.1 澳门欧洲中世纪城市空间的形成	2
1.1.1 澳门教区的成立	2
1.1.2 近代天主教堂的原型	6
1.1.3 澳门教堂的分布	9
1.2 澳门耶稣会的圣保禄学院与教堂	14
1.2.1 圣保禄学院	14
1.2.2 圣保禄教堂	18
1.3 澳门耶稣会的其他教堂	27
1.4 澳门天主教的其他教堂	42
1.4.1 多明我修会教堂	44
1.4.2 方济各修会教堂	48
1.4.3 奥斯丁修会教堂	54
1.4.4 澳门的其他教堂	59
1.5 澳门天主教堂的建筑特点	64
1.5.1 教堂的军事功能	64
1.5.2 教堂的前地空间	68
1.6 澳门基督教新教教堂	70
1.6.1 新教教堂与天主教堂的差别	70
1.6.2 澳门的新教教堂	74

第2章 澳门的妈祖庙	79
2.1 澳门的妈祖文化	80
2.1.1 福建移民与妈阁村	80
2.1.2 澳门的妈祖信仰	84
2.2 澳门妈祖阁	86
2.2.1 妈祖阁的建造时间	86
2.2.2 妈祖阁的建筑布局	88
2.3 澳门其他几座妈祖庙	95
第3章 澳门的佛教寺院	99
3.1 澳门的佛教文化	100
3.1.1 澳门佛教的特点	100
3.1.2 福建移民与望厦村	103
3.2 澳门普济禅院（观音堂）	106
3.2.1 普济禅院的历史	106
3.2.2 普济禅院的建筑布局	108
3.3 澳门观音古庙与城隍庙	114
3.4 澳门莲峰庙	118
3.4.1 莲峰庙的历史	118
3.4.2 莲峰庙的建筑布局	121
第4章 澳门的其他中式庙宇	125
4.1 澳门土地庙	126
4.2 澳门其他寺庙建筑	133
4.3 澳门寺庙建筑的特点	142
4.3.1 宗教功能与世俗功能兼顾	142
4.3.2 规则式布局与自由式布局并存	143
4.3.3 佛、道、俗神共处	143
第5章 澳门的其他外来宗教建筑	145
5.1 澳门的伊斯兰教坟场和礼拜堂	146
5.2 琐罗亚斯德教在澳门的遗迹	148
5.3 巴哈伊教在澳门的会所	152

第6章 澳门宗教建筑保护	159
6.1 澳门宗教建筑保护的发展概况	160
6.1.1 澳门文物保护法的逐步完善	160
6.1.2 澳门宗教建筑保护的现状	161
6.1.3 澳门宗教建筑保护的建议	168
6.2 澳门宗教建筑保护的原则与案例	170
6.2.1 宗教建筑保护的原真性原则	170
6.2.2 澳门宗教建筑的保护案例	171
结语	183
一、澳门宗教建筑的研究价值	184
二、澳门宗教建筑的整体保护	185
后记	190
参考文献	192